

TANGCHAO DE BEIFANGBIANDI YU MINZU

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



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 唐代社会的转型与民族互动 • 「胡人」抑或「少数民族」 • 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
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 • 郭子仪忠君的再解释
文化的选项与祖源的记忆 • 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 • 安菩墓志
铭再考 • 如何阅读边疆 •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书后

李鸿宾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 / 李鸿宾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 7- 227- 04625- 7

I. ①唐… II. ①李… III. ①民族关系—民族历史—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280.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080 号

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

李鸿宾 著

责任编辑 何志明 陈 晶

封面设计 晨 皓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 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1230mm 1/32 印张 12.75 字数 300 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6005 印数 1500 册

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7- 227- 04625- 7/K·586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所收 23 篇文章,最初是为我承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4 年度)而陆续撰写的。当初申报课题,我选择“唐代后期的河北社会与河朔等问题”和“唐后期北方边地与民族问题”两个范围,打算就此对唐朝北方特别是长城区域的民族关系做些研究。在我看来,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民族问题在承继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有融合又有诸种民族势力崛起并与中原、周边各地民族互动的阶段。这些新兴民族势力分布在中原周边,尤其以西北和北部凸显;唐后期的民族关系,由于吐蕃势力的衰落,北部长城沿线地区的民族问题进而突出,于是,这里成为唐后期至五代的一项重要社会问题而被文献所记录。但因时间久远,记录的文献流传至今的,实属凤毛麟角,因此而引起学者们研究的兴趣。我当初选择上述课题的目的亦属此列。但在实际研究中,发现原来的设想固然有其道理,具体到文献翻检和研究、教学的实践,总会有或多或少的变更,所以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断冒出新的想法;另外,我的研究始终处于撰写单篇文章的状态,其原因是论文可以就某个具体问题专门性探索,而要形成一整部前后关联的著作,其撰写的规则应当是在论文的基础上再综合整理,形成前后逻辑清晰并有主线索的架构,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慢慢磨

合。考虑到这点,我的选择一般是先写论文,待到一定时期积攒下来,再将它们统并到一起,以文集的形式发表,即对申报课题有较正式的交代。

在这种思路支配下,我先后完成并出版了《隋唐对河北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3 月版)和《史论杂稿》(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版)两部作品。其中前者是与研究生、本科生同学一起合作完成的,我撰写了 5 篇论文(包括绪论),5 名学生各自撰写 1 篇,共计 10 篇论文,以我“主著”的形式出版。这是此项课题的第一个成果。后者则是我在从事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一项附带性成果。内容主要是我这些年在教学、科研中所撰写的相关文章,内容比较宽泛,不完全是纯粹的学术论文,因它更能够反映我从事工作的具体情景,就利用课题的资助,专门将它出版,算是一个意外的“成果”。此书则是该课题设计中的内容,因我的研究大多属于唐朝北部长城沿线地区与民族的,遂以“唐朝的北方边地与民族”作为书名。读者会看到,这同样是一部论文的集合。

此集所收 23 篇论文,大体可作如下划分:

第一部分系史学专论,包括 18 篇论文:

- 1.《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
- 2.《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 3.《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
- 4.《“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
- 5.《唐代社会的转型与民族的互动》;
- 6.《“胡人”抑或“少数民族”? ——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
- 7.《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观察》;

- 8.《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 9.《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
- 10.《河套地区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
- 11.《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从民族学的角度着眼》;
- 12.《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从阿布思和仆固怀恩个案谈起》;
- 13.《民族性在认同中的位置——以唐朝郭子仪、阿布思、仆固怀恩为例》;
- 14.《郭子仪忠君的再解释——“胡汉”世界与王朝构造的特点》;
- 15.《文化的选项与祖源的记忆——唐朝粟特人汉化个例之一瞥》;
- 16.《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
- 17.《唐朝后期地方、民族势力的结合与区域政权的出现》;
- 18.《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第二部分系墓志铭考释,包括3篇论文:

- 1.《安菩墓志铭再考——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
- 2.《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 3.《何文哲墓志铭再考——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

第三部分系史学评论,包括2篇文章:

- 1.《如何阅读边疆?——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书后》;
- 2.《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书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之我见》。

上述三部分内容,以史学专论为主,这是全书的核心所在;另有2篇书评,因与本书的宗旨有密切联系,也作为一个组成部分放置在全书最后。另有3篇墓志铭的考释文章,其写作亦在本书

宗旨指导下完成,又在我 2009 年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墓志所见唐朝的民族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的范围里,现一并收录于此书,因此,我对本书的定位是:既是我承担的“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的最后一项成果,又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第一项成果。至于其他墓志铭的考订与研究,则是今后一段时期我研究的主要方向,目标是按照申报课题的要求,拟在另外论文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与其相关的著作。

这里附带对本集各文注释的技术规范略作说明。因各文写于不同时段,注释规则略有差异,但均在各自的规范之内,此次集成书,大体保持原有格式,只是对个别地方进行订正。在各文中,凡是征引文献及今人研究的成果,若首次出现,则以“作者、译者、书名、地点、出版社、出版年、页码”的形式标出,若为论文,则以“作者、译者、论文名称、刊物、年份、期号”或“作者、译者、论文名称、书(集)名、地点、出版社、出版年”等形式标示;同一文内若重复出现,则仅列作者、书名、页码,或作者、论文名称,或作者、论文名称、书(集)名、页码等。

目 录

史学专论

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

——从长城谈起 003

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021

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

——以隋唐为例 039

“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 052

唐代社会的转型与民族的互动 065

“胡人”抑或“少数民族”？

——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 073

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从历史学与民族学结合的角度观察 100

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 114

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 128

河套地区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 144

唐前期东突厥复兴反映的族属意识与认同问题

——从民族学的角度着眼 155

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史料分析

——从阿布思和仆固怀恩个案谈起 166

民族性在认同中的位置	
——以唐朝郭子仪、阿布思、仆固怀恩为例	178
郭子仪忠君的再解释	
——“胡汉”世界与王朝构造的特点	186
文化的选项与祖源的记忆	
——唐朝粟特人汉化个例之一瞥	200
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	205
唐朝后期地方、民族势力的结合与区域政权的出现	218
唐末的形势与党项势力的崛起	235
墓志铭考释	
安菩墓志铭再考	
——一个胡人家族入居内地的案例分析	254
唐故游击将军穆泰墓志考释	
——兼论唐朝胡人汉化的问题	285
何文哲墓志铭再考	
——兼论粟特人汉化问题	304
史学评论	
如何阅读边疆?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书后	370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书后	
——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之我见	383
后记	401

史学专论

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

——从长城谈起

一、中国地理的特点

中国历史发展的地域空间与其他国家、王朝比较起来有自己的特点。我这里先举几个例子说明。

一个例子是地中海北岸的古代希腊和罗马。地中海北面和西南面呈现多山地势，古希腊人生活的爱琴海周边则多海湾和盆地，地势起伏不定；有山，但并不高耸，适合于人类生活，但缺少广阔纵横的区域。古希腊人在这些地区建立的国家大都属于互相依靠的城邦制政权，彼此交往和贸易，互相联系，频繁交流。这种地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该种生活方式上的国家制度。继其之后的罗马，特别是罗马帝国，凭借自己的武力向周边扩展，他们较少受到地势条件的限制^①。罗马人建立环地中海的大帝国在统治集团看来并非耗费心力的行动，除了帝国本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比较畅通的地理条件也是支持罗马人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继罗马之后建立的其他帝国，常常横亘欧亚大陆，帝国建立之容易，与这种地理条件具有密切之关系，此为不争之事实。

另一个例子是公元7世纪前期建立起来的阿拉伯帝国。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基本上由平原、高原和沙丘等组成。西亚的高山、高原若

^①不过像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军不畏艰辛穿越阿尔卑斯山击溃罗马人的壮举在当时并不多见。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布匿战争”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

与中亚比较起来,这种地理条件对当时人们的活动几乎构不成严重的障碍。阿拉伯人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凭借武力向周边扩张,很快进入北非、欧洲和亚洲的中部,甚至指向更遥远的东方。

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与上述帝国都不相同。按照格鲁塞的解释,欧亚大陆的南北,分别形成草原游牧和平原、盆地农耕两种生活方式。草原的游牧势力从中国的东北到地中海东部的小亚细亚,频繁地向南推进,他们南进的主要原因就是寻找农耕地区的物资产品。二者之间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彼此的共生关系^①。

欧亚大陆南北的划分,从本质上说是地理和自然条件的界定。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二者之间经常是模糊不清的,更确切地说,南北的互动是被隐藏在南北政治势力的交往之中。除此之外,地理条件在每个地区所产生的具体作用则是大大不同的。换句话讲,同处草原、农耕文明交汇的东亚、中亚和西亚,他们彼此又因各自不同的地理条件差异,而在国家政权的建构上,具有明显的不同特点。

就中国而言,中国所处的地理区域与中亚和西亚都有相当程度的差别。如果我们不考虑单个政权,仅就中国历史活动的范围讲,中国人活动的空间是以黄河、长江为核心的农耕地区而展开的,其足迹遍及周边四夷之地:东及大海,北上草原,西达中亚,南至大海;他们的活动范围达到那个时代所能企及的周边。由此看出,中国政治势力所及,主要受限于地理条件。那么,这种地理条件如何展现的呢?白寿彝先生有一段概括,我认为很清楚地讲明了这种形势的特点。

中国地理条件,由于天然特点而自成一个自然地区。这

^①参见(法)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18页;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Blackwell, Cambridge MA & Oxford UK, 1989, 1992, p.45.

个地区的环境是：北有大漠，西和西南是高山，东与南滨海；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是地理条件最好的地区。在这个自然地区里，任何局部地区的特点、局部地区与局部地区的差异及其产生的种种社会结果，一般地说，都不能不受到这个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的约束。中国地理条件的这个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历史上政治形势的发展。这个影响至少表现在：第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上重大的政治活动具有明显的内向性，这是因为一则四处受阻，一则为大河流域先进的经济、文化所吸引。^①

这段话明白地告诉我们，中国人活动的空间大体上处于中原与周边四夷之地，而逾越四夷之地则是相当困难的：东部和南部都是海洋；东北纵深之地困难重重；北部的高原、草地则是游牧人的天下，农耕者进入亦艰难曲折；唯一拓展的是向西域开进，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纵深之地，唐朝前期曾有过类似的壮举，但受到其他势力的遏制，唐朝没能达到目的^②。于是，在这种特定而又十分广阔的空间地域范围内，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生活就此而展开。

二、中心腹地与周边外围

然而，中国王朝在上述疆域内的活动在历史上并不是均衡的。从早期到后来，中央王朝活动的范围呈现扩大的趋势。

现今考古发掘的成果告诉我们：至少到了新石器时代，中国

^① 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4页。

^② 典型的事件是指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年）唐军高仙芝部与大食军队的交锋。事见《新唐书》卷135《高仙芝传》。参见白寿彝：《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同作者：《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法）张日铭著，姚继德、沙德珍译：《唐代中国与大唐穆斯林》第三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

大部分地区都有丰富的人类文明的遗存或遗迹,说明早在数千年甚至万余年前,各个地区都有古人在活动。他们有自己的住所、村落、公共活动领域,也有防护设施;他们多数定居,但分布不平衡,农业、渔猎、游牧成为主要的生活方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河流域的遗址尤为多见,并且呈现与其他地区联系加强的势头,反映出该地区在所有文明活动的地域之间开始出现中心的痕迹^①。至于黄河流域为什么有这样的优势,学术界曾经不断地探索和讨论^②。不可否认的是,该区域的地理优势和气候为农业生产提供的便利,是主要的因素。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明遗存按地域划分成六大区系,表明当时人们生活的方式具有相同区域内生活习性相似而与周边地区又相异的特点。这种区域的不同,反映出当时人们共同体单位建构的实际状况^③。而黄河流域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它逐渐而清晰地成为沟通各个区域的联合点,或者说它逐渐成为中心区域。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王朝的最早建立是在这个地区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缘故。

黄河流域成为中心的首要条件是它的地理区位。它处在东亚农耕地域的中间,气候温暖适宜,适合农作物的种植和生长;它的河流纵横分布,灌溉简便,成为古代人们生活的理想地域。它周边的地区,条件可能不如它那样理想,虽然这些区域也分布着众多的文化遗存,但它们似乎没有吸引四方的能量,也不具备向四边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合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一书将近百年来有关的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其中与本文有关的内容可以参阅陈星灿等5位学者撰写的《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有助于认识黄河中心区域向国家过渡的问题,该文载《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②此处仅参考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③参见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比较通俗的解释又见同作者:《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4—99页。

扩散的能力,它们的发展很可能指向黄河流域,占领该地借以壮大或发展自己。于是,不论夏朝、商朝还是西周抑或东周,它们尽管来自不同区域,但向黄河流域发展,都成为政治家们的既定方向和政治诉求。

当这些王朝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它们就以此为核心而向周边扩展。它们扩展的幅度与王朝自身的能量成正比,当中心区域力量强大到它觉得足以控制中心以外地区的时候,它就向周边发展,周边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随之成为中心王朝争取或争夺的对象。相反,周边势力也会参与到中心王朝的构建之中,但前提是它们自身有实力,这是其一;其二则是中心王朝内部出现衰弱的迹象,甚至严重衰竭,周边势力就会乘虚而入,进入中原建立新的政权。这种局势的反复再现,就是夏商周的嬗代。

夏人最早活动的踪迹,从现在的研究看,似乎出自今山西南部 and 河南西部,属于传统的中原核心之地^①,商人则远在渤海周围,而周人来自西部,在当时看来均非中原,这两个族群之所以对中原感兴趣,主要是建立在中原地区王朝的正统地位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对他们产生的强烈吸引力之上,中原成为王朝建构核心腹地的地位就此确立起来了。对古人而言,控制了中原,就等于掌握了权力的关键。中原在什么人的控制下,国家政权也就会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与此对应,中原以外的周边,则是陪伴王朝建构的外在因素。这种外在因素与第一位的内在因素相比,显然是处于第二位的。但对王朝国家建设而言,外围地区的掌控,关系到国家政权建设的稳固和王朝的强大,这可能成为夏商周政权决策者们向周边扩展的动力。于是我们看到周人所谓甸、侯、绥、要、荒等五服

^①这是学术界的普遍看法,当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夏朝最早应出自今江浙一带,见陈剩勇:《中国第一王朝的崛起:中华文明和国家起源之谜破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观念的衍生和区域划分的实施^①，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后来王朝概念的建构与国家政权实际建设的方略^②。

三、中心王朝与边地四夷

所谓的中心与周边，即上文提出的中国古人在建构国家和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领土划分和政治观念，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的中心政策。可以说，这种观念持续到近代社会，直至新型国家主权观念和实体建构之后，传统王朝与以西方为主而转成的现代国家之时。我把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国家政权称为“王朝国家”^③，其性质是国家政权有自己的核心区，控制住核心区，王朝就得以建立；核心区的外围或周边是王朝争取的对象，一旦外围被纳入到王朝体系，王朝就变得空前强大；外围地区与王朝至少保持着理论上或名义上的辖属关系；外围区域的丧失，虽然会大大削弱王朝的实力，但它并不能毁灭王朝，虽然王朝的毁灭常常由此而衍生。

在这种观念支配之下的王朝，其经营者们首先关注的对象就是核心区。在北宋以前，核心区围绕关中而展开，关中的战略地位

①参见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页；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6-58页；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王柯著，冯谊光译：《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21页。

②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考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连开：《华夷五方格局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作者：《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③王朝国家与周边四夷的关系，学术界有许多观点，如“宗藩关系”“封贡体系”等。参见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日)堀敏一著，韩升等译：《隋唐帝国与东亚》，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李金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因秦朝在此建都而确立^①。秦之建都于此,是秦国发祥、发展与扩张均以关中为核心格局的自然延伸,秦国兼并东方诸国而形成了—统的王朝,以关中为核心腹地制衡全国的政治、区位结构得以确立。继此之后的西汉王朝秉承了同样的法统格局,东汉王朝虽然将都城东迁洛阳,但以西部(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大致上还是沿袭下来。到隋唐王朝—统体系的再度恢复,以长安为核心的关中制衡全国的格局也得以复原^②。

然而,隋唐一旦确立了上述格局之后,它自身也开始发生变化。至少从高宗、武则天时代起,王朝的政治重心从关中的长安逐渐向中原西部的洛阳转移。转移的原因有政治的,有经济的,甚至还包括个人的偏好;随着唐朝的灭亡和五代政权的更替,都城又转向中原东部的汴梁(今河南开封),这就从整体上改变了传统中国以关中制衡全国政治格局的面貌,而开封建都是在北部地区被纳入到契丹人势力范围的背景下被迫形成的。由此可见,古代中国国家政权建构的格局与政治势力的纵横较量有直接的关联。契丹人的辽朝和党项人的西夏王朝形成后,汉唐王朝体系就被打破了,代之以南北(包括西部若干小王朝)两大政权区域格局的确立。直到元朝的建立,全国大一统的局面才得以恢复。不过这个—统格局的重心之地已从关中和中原转往燕山脚下的大都北京,于是以河北中部偏北的北京制衡全国的政治架构就在元朝正式确定下来,直至今日。

与核心腹地相对应的是外围边疆地区的建构。

以关中为核心腹地的时代(即北宋以前),所谓周边外围之地,大致上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以北、以南和以西的

^①参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38页。

^②参见拙稿:《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